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二

考試·國子監

(上)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二

考試·國子監

(上)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考試·國子監(上、下)/翁萬戈輯. —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4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二)

ISBN 978-7-5476-0898-2

I. ①考… II. ①翁… III. ①教育史—中國—清代 IV. ①G5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73446號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二

考試·國子監(上、下)

翁萬戈輯

策 劃/徐忠良 責任編輯/徐忠良 劉麗娟 裝幀設計/李 廉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

地址: 中國上海市欽州南路81號

郵編: 200235

網址: www.ydbook.com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製版: 南京前錦排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刷: 崑山亭林印刷責任有限公司

裝訂: 上海文藝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9×1194 1/橫16 印張: 58.75 插頁: 4 字數: 468千字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6-0898-2/G·635

定價: 450.00元(上、下冊)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零售、郵購電話: 021-62347733-8538

《翁同龢文獻叢編》新版序

《翁同龢日記》及《翁同龢文獻叢編》是我高祖翁同龢留下的兩大原始歷史資料。《日記》最全、最確的簡體字排印本在二〇一二年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全八冊；而《文獻叢編》雖在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三年五年間由臺北藝文印書館以影印方式陸續出版，但不易達到全國的讀者。現在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徐忠良先生主持下，將發行新版，我不勝鼓舞，樂為之序。

一、《文獻叢編》六集八冊，其第一集《新政·變法》是為應合常熟翁同龢紀念館在一九九八年紀念戊戌百周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開會時贈送參加的人士首先出版的。其餘五集七冊，大致按其內容與時代列次。為了介紹每集的內容及加深讀者對其瞭解及認識，我敦請了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孔祥吉、故宮博物院朱誠如、山東社會科學院戚其章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王道成四位學識深廣的近代史學家為《文獻叢編》相應各集撰寫序言。他們的思想、評論、意見，已成為《文獻叢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此請讀者特加注意。

二、翁同龢的簡歷、翁氏家藏文獻的形成，我之以玄孫身份繼承遺產，而受到幾代先人的教養，得以保存這些歷史文獻，已見於《緣起》。其中也包括我對各位親友賜助的至誠謝忱，茲不贅述。現在願補充一下個人在救護、保存、整理、發表這份不平凡的遺產時的衷心的感念。我並沒有學歷史，但敢於承此重任，全靠『家教』。四歲入私塾時，老師大概都是前清的舉人或秀才，教授法很單純，就是背書。第一本是《詩經》，第一句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繼之為『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節選的《史記》《漢書》，一直到《古文觀止》中自東周到明末的散文名篇。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本生父親翁之憲（一八九六—一九七二）因職務變動由天津遷到秦皇島。我們三兄弟（大哥開慶，二哥傳慶，我行三，原名興慶）的家庭教師受過新教育，能畫地圖，使我們除傳統的國學外，也略知地理、數學等科目，這也使我們在一九三〇年回到天津後，可以入新式的初中學校。兩位兄長入了北平（即北京）

匯文中學，而我因年幼，留在家中，入了新創的天津公學第一班初中（今耀華中學）。那時的國文教員鄭炳勛（字菊如，一八六七—一九五四）站在我的座位前注視我作文寫字，非常賞識。到了高中一年級，我加入了北平匯文中學大哥、二哥的一班，在教師鄭騫（字因百，一九〇六—一九九一）的訓導下，鑽研文史，同時在圖書館裡大量閱讀『五四』運動後的白話文學，從胡適、魯迅等到巴金、沈從文。到了一九三六年考大學的關頭，除得到保送燕京大學（今并入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外，又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劉敦楨教授主持的建築系，而父母及過繼的母親強春卿夫人（她的丈夫翁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在一九一九年去世前選我為嗣，使我成為翁同龢的玄孫）認為上海離常熟近，我應該試一下當時最難考入的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考畢自查物理、數學兩項——學工程的基本科目，我只各得了六十分，沒有希望被錄取。想不到的是考國文的題目《周易以上古製器物者為聖人論》對我沒有問題，兩小時間我憑空寫了一篇文章，竟得到交大國文系主任陳柱（字柱尊，一八九〇—一九四四）的青睞。他是那時交大校長黎照寰（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好友，他提出招生的人才主義，把我收入交大。可是這意外的機遇，對我並不完全合適，因為我的興趣不在工程。在交大的兩年，我學習成績猛進，得以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華後，從上海租界乘船赴美，轉入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而且只再念了兩年就獲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在紐約擔任了幾個月的工程職務。到一九四〇年底，我決心放棄工程，重回到文學、歷史、美術的領域，而主要服務範圍當然是偉大的祖國。

三、上述是我從事整理家故的基本準備，但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學習、修養及經歷是在故鄉常熟的生活體驗。我本生父母同過繼的母親對我的教養有明確的安排，即一切教育到高中畢業，都是跟隨兄長，在天津與北平；只有家庭大事，在我負有『孤哀子』『承重孫』等頭銜的時候，纔回到故鄉，執行典禮。在那些日子裏，我就住在綵衣堂，其大廳仍是明代建築，全部房產是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為孝養母親在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購置的，取老萊子綵衣娛親的故事而名。我依稀記得在只有幾歲的時候，住進了綵衣堂大廳後的房間，而那時常熟仍在『中古時代』，沒有電、自來水、柏油路及一切近代的設備，只有煤油燈、馬桶、井水、拱橋、轎子。大堂的門檻高，幾歲的孩子必

須爬纔能過去。後來回鄉多次後，發現隨着時代的不斷進步，這裡除了水、電、洋車之外，還仍然保持了一些晚清風味，譬如木船。有一次，我陪着過繼的母親（「好娘」）從綵衣堂的後門上船（船分首、尾、中、後艙數部分），由前後兩名船夫撐竿、搖櫓，一直乘行到上海。我睡在中艙的板床上，一夜聽水聲在枕底，其風味至今尚念。又如我十幾歲時，「好娘」爲我雇了一隻小船，整天遊虞山下的西湖，午餐也由船夫供應。每到一個景點，就停船上岸觀賞，使我憶及高祖在他日記中描寫的各洞、岩、寺等名勝……這也是我編輯這部《文獻叢編》的經歷準備。

四、一九四一年尾，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聯合中國向侵略者開戰，我以既有中國方面的知識又具電影的技術獲邀參加美國軍部的特殊電影機構，編製「我們爲何作戰」系列中《中國之戰》一片。影片接近完成時，又被聘爲美國國務院的顧問，利用羅斯福總統緊急款項，特創了譯製美國電影送到戰時陪都重慶，藉以溝通兩國間的瞭解。這項工作持續了三年，而我也自然地變成了留美的華僑。但我不斷地與祖國聯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我仍推進電影事業，而且有機會在紐約結交了美國政府邀請的中國文化界名人——孫瑜、老舍、司徒慧敏、葉淺予、戴愛蓮，而且同後三位合作拍攝了十分鐘的短片《中國民間舞兩種》。之後司徒先生加入了我的小組織：中國在美電影企業公司。這對我在一九七九年回新中國後的文化活動有莫大的幫助。書歸正傳，對於在美國安全保存翁氏家藏古籍、書畫及文獻的工作，最重要的人物是我已故的老伴程華寶。

五、一九四三年，當我爲美國國務院譯製解說美國情況的電影時，得到資金創作新片，包括拍攝《鎔美鑄華》——介紹中國學生在美留學情況，從晚清的容闥（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到二次大戰期間的同學。此片規模較大，於是我回到自己學習電影技術的紐約哈蒙基金會（Harmon Foundation），請其主持，包括聘用已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分任寫作、攝影等工作。留學生一共三人，包括剛從著名女校布林茂爾（Bryn Mawr）英國文學系畢業的程華寶。她負責搜集資料，接洽被選入內容的機構、人物，以及編寫影片的解說詞，等於做我的第一助手。在天天面談商討的情況下，兩人發生愛情，在一九四四年結婚，婚後仍然是密切合作。日本戰敗後的中國，陷入了國共兩

黨的內戰；我在紐約的企業當時發展相當順利，很難抽身回國，但華寶決心回上海省親，在一九四八年春間攜三歲女兒以思乘船先歸，當然我立即追隨，在同年六月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 DC-3 飛機自紐約飛抵上海。拜見華寶父母後，我們三人先謁「好娘」，然後北上天津看望我的本生父母及兄弟、姊妹和侄兒、侄女。馬不停蹄，我同華寶到了北京，拜訪表親王錫桓夫婦，被邀晚餐時，碰到了國民黨自遼寧敗退的兩員軍官，坦陳蔣介石在軍事方面大勢已去。第二天我就同華寶回到天津，將存放在該地長期租房中的「家藏」選擇包裝（由我本生父母及大哥翁開慶大力協助）。安排華寶及以思坐火車回上海後，我帶着「家藏」搭乘開灤礦務局的小運煤船南下，抵滬後將「家藏」都集中於「好娘」在上海所租的「弄堂房子」裡。八月間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造成空前的通貨膨脹。到了十一月，我帶着華寶，以思坐上最後一班由中國飛美國的西北航空公司飛機回到紐約。而「家藏」則在事前安排航運——到達時間的懸殊使我及華寶夜不安寐長達一月之久。終於，十二月十八日得到安全運達紐約的船運公司通知。

六、爲了確保最高等級的安全，我倆立即在紐約出名的儲藏大樓租了一間防濕防火防盜的庫房，將「家藏」保存其中。經過了二十八年，我們決定自紐約遷到美國東北角新漢普沙州(New Hampshire)的小鎮萊姆(Lyme)的一片位於小山半腰的林居中住，自己開闢園地，在一條小溪旁建造房屋，稱「萊溪居」。除珍貴的書畫存入附近的銀行保險箱外，大部分文獻都存放在自己設計、營建的書房畫室中。一九九七年初，得到臺北藝文印書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的同意，開始《翁同龢文獻叢編》的出版工作，而編輯工作繁重的細節就是把文獻原稿一頁一頁地複印，寄到臺北去設計、印刷。這種極其需要聚精會神地心手相應的工作，都歸了華寶。她在我們自備的大複印機旁，不辭勞瘁地站着一頁一頁地操作，尤其注意那些已經破爛或極脆弱的原件。她的功績不見於這全部《文獻叢編》六集八冊的任何表彰。念及她已在二〇〇三年去世，同我合作近六十年，留下的著作不止於此，我怎能不潸然淚下！

撰寫此序時，不免仰首看到牆上懸挂的高祖所書四扇屏，寫給我本生祖父斌孫的三弟順孫（字寅臣），顯然是大字的訓言，節錄如下：

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海外亦粗有經籍……姪孫應熟看前後漢史、韓柳文。

壬辰夏五爲寅臣姪孫 瓶叟（時合一八九二年六月）

我們家傳的歷史感，就是我編輯出版這部《文獻叢編》的動力。

翁萬戈寫於萊溪居

二〇一四年一月，時年九十五歲又半

緣起

在十九世紀入後幾十年中，以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鴉片戰爭為歷史上的分水嶺，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急劇地走下坡路，每況愈下地陷入了甲午戰爭（一八九四）的莫大危機，使有頭腦有熱血的朝野人士認清了只有變法圖強，纔可以免於亡國之禍。在這種極其艱難的環境中，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從一甲一名進士出身到兩任帝師，歷官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參與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危的重大決策，終於在戊戌變法的前夕，被開缺回籍，結束了四十二年的從政事業。身為晚清政局的中樞分子之一，他鞠躬盡瘁地設法保全國土，改變頹局，但崩潰的大勢遠勝於革新的志願和努力。這位近代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終不能免為突出的悲劇性人物。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教材分經、史、子、集四大類，而史是骨幹：經裡不能無史，子、集更不能脫離史。翁氏精通史學，而且以史為教授皇帝的主要工具。他深深體會歷史的意義，所以一生記錄極勤：最特出的是他的日記——自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五八·七·三十一）到光緒三十年甲辰五月十四日（一九〇四·六·二十七），幾乎整四十六年，包括了他整個從政時期及罷黜後的六年，在他逝世前六天纔絕筆。這部第一手歷史資料在乙丑年（一九二五）由張元濟先生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七三年據此縮印），在一九七〇年臺北趙中孚先生曾編輯此日記的排印本，後來北京中華書局陳義傑先生又點校新的排印本，陸續出版。在中法越戰期間，他受命初次入軍機，加寫《軍機處日記》：起自光緒九年二月初一日（一八八三·三·九），訖於次年三月十一日（一八八四·四·六）；在一九三八年由收藏者燕京大學圖書館影印出版。其實，除這兩部日記（一大一小）之外，他還留下了大量的文獻：隨手記、奏稿、議摺、信件、輿圖及他經手負責的他人奏摺、說帖等等。這些若非他的手迹，就是他過目的文件，總之，都是第一手資料，值得近代史學者的探索與參考。不過這些文獻分散在各處，近百年來損失的數量也必可觀。除去已歸公有的圖

書館、博物館及檔案館的那些資料之外，恐怕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翁氏家藏』的這一組。而這裡所謂『翁氏家藏』的範圍，需作下述的解釋。

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又號瓶生及瓶廬，晚年常用松禪，謚文恭，所以他的著作、書畫在出版時，常標『翁文恭公』『翁松禪』或『松禪老人』。他的父親翁心存字二銘，號邃菴，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為同治帝師，卒謚文端。長子翁同書（即翁同龢長兄），字祖庚，號藥房，官至安徽巡撫，卒謚文勤。次子翁音保，早卒。三子翁同爵，字玉甫，官至湖北巡撫。翁同龢最幼，無子，由同爵子曾翰嗣；曾翰的長子安孫又無子，由同書的曾孫之廉嗣；之廉無子，由同書的玄孫興慶嗣——而我就是興慶，自號萬戈。因此，我的本生世系是高祖同書，曾祖曾文，祖斌孫，父之憲；而族譜上的世系是高祖同龢，曾祖曾翰，祖父安孫，父之廉。在中國的社會制度下，我繼承了松禪老人的遺產，包括故鄉常熟、書畫，以及前面所述的文獻。我生於一九一八年，而次年我過繼的父親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就去世了，這些『紙頭紙腦』的遺產就一直保存在我過繼的母親（即我的二伯母）在天津長期租用的房子裡。但她主要住在常熟綵衣堂，其中仍有不少文物。自一九三七年日本發起全面侵略戰爭以後，我們到上海租界避難，綵衣堂就不再是住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它被改為傷兵醫院，其後又經過『文革』，堂內所藏的什物與資料基本上毀散無存。我在一九三八年從上海交通大學轉到美國普渡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電影工作，一九四八年重返故國，在天津初次檢點由松禪老人傳到我的這一部分古籍、書畫及文獻，裝箱運上海，然後在接近年終混亂的局面下，由海運到了美國。這批文獻基本上就是本叢編所指的『翁氏家藏』，可以說是狹義的『翁氏家藏』。

在此必須提起另一組翁氏家藏的翁氏文獻，一向保存在我本生高祖同書一支的家裡，其原來的數量相當可觀。尤其是因為祖父斌孫是松禪老人得意的侄孫，所以他得到不少珍貴的松禪手稿及資料。一九五〇年父親翁之憲將北京圖書館趙萬里、高熙曾兩先生所選的家藏善本悉數捐獻，其中也有很多翁心存、翁同書及翁同龢撰寫、編輯及批注的文獻和稿件，例如翁心存撰《知止齋遺集》二十二種稿本，共一百十一

冊，及翁同龢輯撰的《瓶廬叢稿》二十六種稿本，共三十冊。那時我大哥開慶侍父在場，他還記得父親談及常熟綵衣堂夾壁中尚有藏書，可能幸免兵燹；趙先生當即前往搜尋，聽說有所收穫，也歸入北京圖書館。這些當然已不在現在『翁氏家藏』範圍之內。至於父親留下的少數祖先遺迹，又受到『文革』時的抄掠破壞。即使如此，還有一些歸還到開慶兄及永慶、銘慶兩弟手中，如殘存的《松禪年譜》（自訂）及松禪老人寫給斌孫的很多封信。這一部分『翁氏家藏』的殘餘，在適當的地方可能也用在本叢編之內——自然要標明目前的藏主。

現在要談到整理『翁氏家藏』翁同龢文獻的過程。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這三十年中，我在紐約一家最安全的儲藏庫裏租了一間小儲藏室，安置這些久存天津的先人遺物。然後我決意脫離城市，在美國東北角的新罕普沙州一個萊姆小鎮的山間自己設計建造屋舍，小溪映帶，因稱『萊溪居』，而基層全部是藏書及工作之所，具備了展開文獻從事整理的條件。一九七九年在去國三十一年後初次有機會重返故土，在天津和北京與闊別的開慶兄、永慶及銘慶兩弟歡聚，在常熟又踏上了綵衣堂的門檻。回憶我兒時一直受本生父母的教養，在私塾與開慶大哥（長我三歲）、傳慶二哥（已故）同學，到了北京匯文中學高中又同學三年，時常一同工作，於是提議請大哥大嫂到萊溪居小住數月。第一次在一九八一年，我們開始整理家故的工作，但進展不多；第二次在一九八九年，努力完成了總目錄；而主要的是在第二次一九九六年，從六月起，大哥差不多每天都翻閱、檢點、分檔，而且有些比較重要的項目，他把稿本的行草書『譯』成正楷。這樣持續了約六個月。所以這叢編的基本整理工作，是開慶大哥的功績。

關於編印本叢編的構想，我懷之已久，但總達不到成形的地步。一九九四年五月下旬，常熟市政府和中國史學會聯合主辦了『甲午戰爭與翁同龢學術討論會』，以紀念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百周年及翁同龢去世九十周年。我在會場上發表一短篇《翁氏家藏文獻述略》，報告截至該時這組歷史資料部分公開發表的情況和日後規劃進行的工作綱要。這個可以簡括為下列三條：

（一）供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利用，以書及雜誌的方式發表，例如謝俊美

教授的專著《翁同龢傳》；

(二) 以影印方式將原稿整理成集後陸續出版，這是繼先父經手影印《翁文恭公日記》《瓶廬叢稿》等之後的工作，以供學者研究；

(三) 以專著的方式編印《翁同龢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代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籍善本目錄》等。

顯然，本叢編就是上述第二條的具體實現。

綜觀全體資料，大致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從政方面，一是個人及家族方面。而本叢編只限於前者，把後者留待異日處理。再分下去，從政方面的資料可列為六集：

- 一、考試及國子監
- 二、內政·宮廷
- 三、中法越南問題
- 四、甲午戰爭
- 五、中德、俄、英交涉
- 六、新政·變法

從這六集的標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半是應付列強的侵略壓迫，而最後一集則達到變法圖強的覺醒。明年是戊戌變法的百周年，所以首先編印《新政·變法》這一集，以資紀念。其他各集，當陸續出版，因每集的內容有其獨立性，所以并不一定按照以上的次序與讀者相見。我去國將近六十年，學識有限，幸得許多益友之助，纔能擔起這件工作；可是錯誤難免，敬希賢達指教，以備在日後改正。

最後，我特別感謝下述幾位對我的鼓勵與幫助：家兄翁開慶的整理標目，是完成叢編的基礎工作，我在前面簡略談過。他在萊溪居時孜孜不倦，日復一日，我們一齊研究、探索，恍如童年及少年時代同窗之樂。雖然多半時間我們遠隔太平洋，但在頻繁的書信中，也不斷商討這些整理家故的事項。可以說，這部叢編是我們兄弟合作的

成果。其次是中國近代史學家孔祥吉先生，他對戊戌維新運動有專著，目前被邀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從事專題研究，使我有機會時常請教。《新政·變法》的資料編排得到他的改正，同時又蒙他賜以長篇前言，談及這些文獻的重要性，使積塵百年的舊紙，充滿了適於古為今用的生活力。然而，像本叢編這種題材比較專，規模又相當廣的文稿，很難引起出版家的興趣。藝文印書館有此見識魄力，毅然接受，這不得不歸功於該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嚴一萍夫人。我的故友嚴一萍先生既是甲骨學專家，又是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企業家。他在一九五二年創辦藝文印書館，所印《百部叢書集成》，是中文圖書館必備的重要參考資料。我有幸在一九六八年得識嚴先生，合作影印我家藏的《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結交以來使我深佩他以學者精神來發展文化事業的志願及成就。他在十年前逝世後，嚴夫人繼其遺志，同樣地為學者服務；今春我們在臺北商談本叢編的計劃，她明快地分析綱要及細節，提出具體進行方式，毫不遲疑地擔起了出版的責任。我既欣愉又欽佩，在此謹申由衷的謝忱。

一九九七年秋葉將紅時翁萬戈誌於萊溪居

《考試·國子監》(上、下)序

王道成

科舉，是中國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這一制度，創始於隋文帝開皇（五八一—六〇〇）年間。唐、宋、元三代，進一步發展。到了明代，已形成比較完備的制度。一六四四年，清王朝建立後，採納了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的建議，繼續實行科舉，決定於順治二年（一六四五）秋八月舉行鄉試，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春二月舉行會試。並且規定：『嗣後以子、卯、午、酉年鄉試，丑、辰、未、戌年會試。奉特旨開科，則隨時定期。』^{〔一〕}清代的科舉制度，從此開始了。

清代的科目，有文科、武科和特科。武科影響不大，特科次數很少，文科則不僅次數很多，而且影響十分深遠。所以，人們談論清代科舉，主要是談文科。

一

清代的學校，和明代一樣，是科舉的必由之路。在清代，地方有府、州、縣學，中央有國子監。府、州、縣學的學生，稱為生員。國子監的學生，則稱為國子監生。國子監亦稱太學，所以，國子監生亦稱太學生。清代的知識分子，凡是沒有取得生員資格的，不論年齡大小，都稱為儒童或童生。童生經過縣試、府試和由學政主持的院試，成績合格，按定額錄取，分別進入府、州、縣學，稱為生員。生員有三等：一等是廩膳生員，簡稱廩生；二等是增廣生員，簡稱增生；三等是新入學的，稱附學生員，簡稱附生。國子監是全國的最高學府，學生來源廣泛。《清史稿》說：『國子監』肄業生徒，有貢、有監。貢生凡六，曰：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例貢。監生凡四，曰：恩監、蔭監、優監、例監。蔭監有二，曰：恩蔭、難蔭。通謂之國子監生。』歲貢，是學政每年從本省府、州、縣學廩膳生員中按年資選送的；恩貢，是遇國家慶典或皇帝登極特別恩賜的；拔貢，是學政從院試一、二等生員內按文行兼優的標準選拔的；優貢，是府、州、縣

〔一〕《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百三十。

學的廩、增、附生文行兼優，由學政與督、撫推薦，升入太學，朝考合格的，副貢，是各直省（直隸及其他各省）鄉試，文理優長，限於名額，取作副榜的。以上五種貢生稱為『五貢』。皇帝恩賜入監的稱恩監，因祖、父為朝廷效力或死於國事而得以入監的稱為蔭監，由增生、附生選優入監的稱優監，由俊秀（童生）援例報捐的監生稱例監。由廩、增、附生或俊秀監生援例報捐貢生的稱例貢。

府、州、縣學生員，參加學政主持的科試，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名列前茅（大省前十名，小省前五名）者，就取得了參加鄉試的資格。其他名列三等的生員及因故未能參加科試的生員，在鄉試之年的七月下旬，還可以參加學政主持的錄科考試。錄科未取及未參加科試、錄科的生員，還可以參加一次錄遺與大收的考試。錄科、錄遺與大收的考試，完全和科試一樣，只要考試合格，就可以參加鄉試。在國子監肄業的貢生和監生，經國子監考試錄科，就可以參加鄉試。在原籍的貢生和監生，願到北京參加鄉試的，必須在這年的二月（福建、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湖南等省可延至四月）到監肄業，才能由國子監錄科。其他的貢生和監生，則由學政錄科，參加各直省的鄉試。

二

清代的鄉試，每三年一次，於子、卯、午、酉年舉行，稱為正科。遇登極、萬壽等慶典，特詔舉行的稱為恩科，而正科或於前一年預行，或於後一年補行。清代後期，還有恩科、正科合并舉行的事例。《周禮·地官·鄉大夫》有『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的記載，所以，人們稱鄉試這一年為『大比之年』。

清代鄉試，除直隸考生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之外，其他各省都在省城舉行。考試的試場稱為貢院。順天貢院，建於北京崇文門內觀象臺西北，南向。大門外有磚門四座，牌樓三座，大門五間，上懸『貢院』墨字匾。二門五間，稱為儀門。三門三間，上懸『龍門』金字匾。龍門的北面，是一座二層的明遠樓。明遠樓的北面，是一座七間的至公堂。至公堂後是內龍門，門內是聚奎堂，七間。最後是會經堂，五間。自龍門至至公堂甬道東西兩側，是東西文場。東西文場各有南向成排、形如長巷的號房五十七排，共九千零六十四間。東西文場又設官生號房六十一間。西北隅小號房四十排，共

八百三十六間。每排號房爲一字號，用《千字文》排列，在巷口門楣上書「某字號」。每一字號內，號房的間數多少不一，隔以磚牆。每間號房，約高六尺，深四尺，寬三尺，無門。東西兩面磚牆離地一尺多至二尺多之間，砌成上下兩層磚托。上有木板兩塊，可以自由移動。白天將木板分開，一上一下，上層是桌，下層是凳。晚上，將上層木板移至下層，並在一起又成了卧榻。考試期間，考生吃飯、睡覺、寫文章都離不開它。這兩塊木板，稱爲號板。巷口有柵欄門，巷尾有廁所，巷的寬度約四尺。考生入號後，即將柵欄門關閉上鎖。考生的一切活動，包括烹茶煮飯，都在這又矮又窄的狹小天地之中。文場的東西南北，各有瞭望樓一座。站在樓上，可以看清考生們在號房內的活動。自至公堂至會經堂及二門外東西兩側的房屋，則是有關人員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貢院的四周有圍牆兩層，外牆高一丈五尺，內牆高一丈。『圍牆四周，遍覆荊棘』。所以，貢院被稱爲『棘闈』。各省貢院與順天貢院大同小異。

清代鄉試，例於秋八月舉行，稱爲『秋闈』。共三場，每場三日。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前一日點名入場，後一日交卷出場。爲了防止考生作弊，入場時要進行嚴格的檢查。搜檢完畢，考生各按卷號進入號房，不得在號房外停留。某字號人滿，即將某字號柵欄門關閉上鎖，不許私開私出及傳遞茶湯等物。考生全部入場後，鳴炮三響，貢院大門、龍門亦關閉上鎖，由監臨加封。

鄉試試卷，要分編字號。各直省鄉試，考生來自本省，情況比較簡單。順天鄉試，考生來自全國，情況相當複雜。爲了便於分別，直隸編貝字號，奉天編夾字號，熱河承德府編承字號，宣化府編旦字號，滿、蒙編滿字號，貢、監生編皿字號。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分南皿、北皿。以直隸八府、保安二州、遼東、宣府、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西之貢、監生爲北皿；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之貢、監生爲南皿。康熙、雍正年間，略有變動。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又分爲南、北、中皿。以奉天、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之貢、監生爲北皿；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之貢、監生爲南皿；廣東（先爲南皿，乾隆六年改中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之貢、監生爲中皿。此後成爲定制。

清代鄉試，除康熙時曾一度改爲兩場外，其餘均爲三場，考試內容却有幾次變化。

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規定:首場試『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考生可自選一經;二場試『孝經』論一篇,詔誥、表各一通,判五條;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廢八股文,以策、論、表、判取士。分爲二場:第一場,試策五道;第二場,試『四書』論一篇,經論一篇,表一道,判五條。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恢復舊制,仍用八股文,試『四書』『五經』。因爲考生大都不作詔、誥,形同虛設,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下令刪去。乾隆後期,纔形成定制:第一場,試『四書』文三篇,詩一首;第二場,『五經』文五篇;第三場,策一道。『四書』文和『五經』文,都是八股文,只不過前者是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書中命題,而後者則在《詩》《書》《易》《禮記》《春秋》五部儒家經典中命題罷了。三場試題,除順天頭場試題由皇帝欽命外,其他兩場和各直省一樣由考官自行擬定。

鄉試期間,貢院至公堂後的內龍門由監臨封鎖,門外挂簾。場中官員,根據工作性質,分別住在簾內和簾外,於是有內、外簾官之稱。主考、同考、內提調、內監試、內收掌爲內簾官;監臨、外提調、外監試、外收掌、受卷、彌封、謄錄、對讀等爲外簾官。這些官員,職責不同,人選和選派方法也不一樣。

主持鄉試的考官,稱爲主考。主考有正、有副。各直省主考,原來都是二人。只有順天主考,從乾隆中葉開始,增爲一正二副,同治年間,更增爲一正三副。選派主考,最初不限出身。雍正三年(一七二五),頒考試試官之令,始限於從翰林及進士出身的部院官員中選派。主考、副主考,都是臨時差使,沒有任期,考試完畢,仍回原職。

同考官的職責,是分房閱卷,故稱房官,亦稱房師。順天同考官,由禮部會同吏部選用科甲出身的中、下級官員,由皇帝欽定。各省同考官,初用本省科甲出身的官員和鄰省進士出身的推官、知縣或舉人出身的教官。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停用本省現任知縣,於鄰省在籍候選的進士、舉人中,考選文行素優者擔任。又因『兩省接壤之地,居址相連,不免親朋往來,素相交好』,爲了避免『暗通關節、夤緣作弊』,附近三百里者,不得咨送。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又改爲由各省督、撫於本省進士、舉人出身

〔一〕前書,卷三百三十四。